

大陆与台湾
当代文学语言比较论

张卫中◎著



南

京大学出版社

大陆与台湾 当代文学语言比较论

张卫中◎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陆与台湾当代文学语言比较论 / 张卫中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305-18960-9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998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大陆与台湾当代文学语言比较论

著 者 张卫中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251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960-9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得到江苏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49年以后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研究”(项目号:10YJA751112)资助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篇 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论

第一章 大陆与台湾当代乡土小说语言比较	35
第一节 历史语境的差异	35
第二节 语言态度与策略的差异	39
第二章 大陆与台湾新生代小说语言比较	47
第一节 语言的陌生化	48
第二节 语言的诗化	53
第三节 语言的杂色化	59
第三章 大陆与台湾后现代诗歌语言比较	64
第一节 语言的游戏化	66
第二节 反讽、谐拟等修辞手法的使用	72
第三节 语言的杂语化	77
第四章 大陆与台湾当代“诗化散文”语言比较	84
第一节 时代语境与文学背景的差异	85

第二节 语言的差异	89
-----------------	----

第五章 郑敏、余光中语言理论的比较与反思	99
----------------------------	----

第一节 质疑“五四”白话文运动	100
-----------------------	-----

第二节 批评声音中的变调	104
--------------------	-----

第三节 简短的评价	108
-----------------	-----

中篇 台湾文学语言问题专论

第一章 台湾当代小说语言流变论	115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语言探索	116
-------------------------	-----

第二节 乡土文学时期的语言探索	120
-----------------------	-----

第三节 20 世纪 80 年代多元化时期的语言探索	123
---------------------------------	-----

第二章 台湾乡土小说中的“杂语”现象	129
--------------------------	-----

第一节 “杂语”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130
-------------------------	-----

第二节 “杂语”与作家的意识形态诉求	134
--------------------------	-----

第三节 “杂语”与台湾作家的身份认同	140
--------------------------	-----

第三章 台湾当代诗歌语言流变论	146
-----------------------	-----

第一节 “现代诗”的语言探索	147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诗人的语言探索	153
-----------------------	-----

第三节 多元的诗歌与多元化的语言探索	159
--------------------------	-----

第四章 台湾新世代诗歌语言论	163
----------------------	-----

第一节 语言的游戏化	165
------------------	-----

第二节 语言的陌生化	167
------------------	-----

第三节 语言的杂语化	170
------------------	-----

下篇 大陆文学语言问题专论

第一章 新时期作家语言观念的变革及意义	175
第一节 语言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	176
第二节 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语言变革的内容	178
第三节 语言观念变革的意义	182
第二章 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变革与特点	190
第一节 新的环境与新的观念	190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语言的特点	192
第三章 新时期作家对诗性语言的再造	202
第一节 新的时代与新的背景	202
第二节 新时期作家对诗性汉语的再造	204
第四章 新世纪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212
第一节 问题与背景	212
第二节 病象与表现	214
第三节 历史与现实原因	223
附 录	
一、语言本体论的限度——关于新时期小说语言探索的思考	226
二、张悦然小说语言论——兼谈新世纪小说中的“新诗性”语言	241
参考文献	252

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的发生、变革,特别是早期几个主要文学运动都给予较多的研究,但是对两岸文学语言发展的比较却关注不够。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研究中,两岸文学语言比较研究与单独的大陆文学语言或台湾文学语言研究的差异是,比较研究可以将汉语文学语言发展的两个流向互相参照,更深入地了解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发展各自的特点,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总体特点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清末民初,很多文人学者对汉语的发展曾提出了多种可能的选择,包括整体上废除汉语,使用世界语(吴稚晖等);保留汉语,废除汉字,使用拼音字母(早期国语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保留汉语、汉字,但在书面语方面废除文言,使用白话文(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时期中国人在语言变革的几个选项中最终选择了比较保守的一个,即仅仅进

行了书面语的变革。其后,即便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现代白话作为书面语以后,中国人在现代语言建设方面,仍然面临很多选择,例如在欧化语、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中现代语文主要吸收哪种资源?现代语文在发展中,是更多地吸收欧化语或文言,即更多地保持书面语自身的特点,还是更多地吸收口语,包括方言土语,走一条口语化、大众化的发展路线?这些都是现代文学语言在建设必须做出的选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陆与台湾虽然同样经历了语言变革,但是两岸有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其语言选择还是显示了很大的不同。台湾自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 1895 年被割让给日本,经历了 50 年殖民统治;1949 年,国民党战败入台后大陆与台湾又有了一个新的分离。因而,就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变革来说,大陆与台湾虽然在早期的选择上具有一致性,即都选择了变文言为白话的变革方式,但是在文学语言建设方面,却显示了较大的差异。

“五四”以后,大陆作家秉承晚清和“五四”两次白话文运动的策略,将“言文一致”作为语言建设最基本的追求;而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左翼文学崛起,文学语言建设中又加上了更多的政治诉求,左翼作家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突出地关注了大众化的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起的大众语讨论中,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语言运动,这场运动“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样,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认为白话文是一种“新式文言”,它不仅没有实现言文一致,反而拉大了知识者和大众的距离,因而他提出“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①。郭沫若对革命文艺的要求是:“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说道”

①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 页。

五百四十二万遍通俗!”他认为革命文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①。抗战爆发后,动员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成了中国作家的首要任务,语言大众化也成了一项事关抗战大局的问题。特别是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新生的革命政权将语言大众化视为作家的政治态度和党性原则问题,并树立了像赵树理这样的语言大众化的典范,延安文艺界领导用政治之力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语言向大众化、民族化和通俗化的发展。其后,新中国文学在语言上主要是继承了延安文学的策略,1949年后大众化、民族化仍然得到了强力的推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由左翼作家发起的语言大众化运动对大陆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方向,塑造了其语言形态。

而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方面,台湾与大陆显示了较大的差异。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是在日据时期,这场变革有着更复杂的时代背景。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考虑语言变革,实现汉语的现代性转型,但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要的任务还是在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对抗中,抵抗日语的蚕食,因而台湾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像大陆知识分子那样仅仅考虑语言变革的利弊,他们不能仅仅关注语言的新与旧、现代与古代这样的问题,还必须从整体上考虑有利于汉语脉息的保存,因此,必须更多地容忍旧文学、旧语言的存在。与大陆相比,台湾语言的变革一开始就是包容的,不是那种二元对立式的变革。如汪毅夫所说:在台湾现代文学起步以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只是部分地得到了部分台湾作家的响应”。“部分台湾作家解决和接受了国语(白话),但罕有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放松或放弃了文言。”“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写作用语,文言在日据时期

^① 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始终是台湾的主要写作用语之一。”^①日本学者横路启子也反对有人提出的“历经新旧文学论争后新文学获胜，旧文学败北而消失”的观点，她认为：“文言文并非被白话文所‘取代’”，“实际上旧文学仍以报纸和杂志等作为文学场域的新媒体继续发展”。她指出：“《三六九小报》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中算是经营较久的代表，各诗社的活动也仍在继续存在，发展的成果则以杂志或书籍的形态保存下来。”“文言文并非被白话文所‘取代’，旧文人终究无法放弃以文言文书写自己的思想和文学作品。”^②

“五四”以后，如果说大陆是在致力于包括语言大众化在内的语言建设，台湾作家则更多地要为保留汉语的一线脉息而斗争。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日语的力度正是在台湾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关键期逐渐加强。抗战爆发后，当局强令废止台湾报刊的汉文栏，禁止《台湾新民报》使用中文，《台湾新文学》则被迫停刊。而1945年台湾光复后，很多台湾作家又必须从日文回到中文，在语言上又经历了新一轮的转换。

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与台湾出现了新的隔离。在大陆，文学体制由多元转向一元，它更多地成为思想宣传的工具与手段，语言政策则继承了延安文学的传统，继续推行大众化、民族化的方略。而台湾文学则有很大的不同。虽然194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文化与思想控制，这个时期台湾出现了政治意味强烈的“反共文学”“战斗文学”，但是整体上台湾的创作环境还是宽松和多元化的。另外，1949年以后，一批大陆作家，包括胡适、梁实秋、杜衡、谢冰莹、胡

① 汪毅夫：《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09页。

② [日]横路启子：《文学的流离与回归——三〇年代乡土文学论战》，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31—132页。

秋原、陈纪滢等，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这批作家让“五四”以来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得到延续和发展。朱双一在比较大陆与台湾文学的差异时就突出强调了两地文学在走向上的不同。他指出：“新中国文艺某种意义上是延安解放区文艺的延续和扩展，而台湾文坛则是国统区文坛硕果仅存的延绵。这一历史造就的文坛基本态势，使得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分流。所谓台湾当代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传统隔绝了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在台湾，原来左、中、右并存的国统区文坛，左翼一脉被切断、禁绝了，其余则随着国民党移转而来，成为台湾文坛的主要成分，这些非左翼的文学脉络在台湾得到延续，在大陆反倒销声匿迹了。”^①

与文学的分流相对应，大陆与台湾的语言在 1949 年以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流；大陆文学语言建设主要是沿着由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开辟的大众化、口语化的方向前行；而台湾文学虽然也有大众化、口语化，甚至有使用方言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并未成为主流，台湾作家在避开了大众化、口语化的选择后，更多的是在欧化语和文言中寻求借鉴，他们以汉字为依托，更多地致力于挖掘汉语书面语的表现功能，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台湾作家创造了很有特点的文学语言，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大陆语言的道路。

文学语言的发展、建构，如同文学的主题、创作方法一样，从来就没有一个“自然的”“本然的”状况，它们都是在特殊的知识场域中，各种权力话语斗争、角逐的结果，而大陆、台湾文学语言的不同也清楚地反映了 20 世纪两岸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往人们单一地研究大陆文学语言的特点，往往会把中国文学语言的语言形态视为某

① 朱双一：《文学思潮变迁中的当代台湾小说》，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第 63 页。

种“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将两岸语言的发展道路放在一块儿比较时,就能清楚地看到,“五四”以后汉语书面语的发展本来可能有多种道路,每种选择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大陆文学语言来说,以往因为在汉语内部缺少一个参照系,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把大陆文学语言的演变看作“自然天成”,认为文学语言的发展就本来应当如此,而有了台湾文学这个参照以后,才能够看到,事实上 20 世纪历史上很多政治、文化事件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左翼文学的崛起、抗战的爆发,以及新中国的建立都对大陆现代文学语言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目前文学语言的形态只是汉语书面语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是被历史“创造”出来的,而非天然生成的。

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的差异一方面可以在历史的比较中看出来,同时它在两岸作家的语言实践中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非常有趣的是,在早期的比较中,主要是一些作家,而非专业研究者更早地关注到这个差异。

王安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的《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一文中就专门讨论了两岸文学语言差异的问题。她认为:大陆与台湾小说语言最主要的区别是:“大陆小说语言口语化,这口语因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因此也更加方言化与俗语化;台湾小说语言则是汉语技术化,即是语文化或书面化。”经过充分比较以后,她认为,大陆文学语言充分口语化,作家驾驭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更有自信,特别是人物语言方面,大陆作家总是给人物更多说话的机会,让人物在言谈中展现自己的性格,因而她认为大陆小说更有戏剧化特点;作家的干预较少,作家总是尽可能让人物有自我展现的空间。而台湾文学走的是一条依托书面语的道路,作家更多地通过挖掘汉字的表现功能激发读者的想象,通过语言的陌生化、熟词生用,刷新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台湾作

家真正依托汉语汉字,通过它创造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

王安忆以自己的《小鲍庄》与台湾作家宋泽莱的《打牛滴村》为例,详细说明了两岸作家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她说《小鲍庄》中更多地让人物自己说话,也使用了大量方言土语。例如《小鲍庄》第一节有这样的叙事:“鲍彦山家里的,在床上哼呻,要生了。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夹了一杆锄子,不慌不忙地朝家走。‘不碍事,这是第七胎了,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碍事,他心想。’”王安忆说,这段话中不管人物语言还是叙事语言使用的都是皖北农村的方言土语:“‘家里的’是某些农村里对妻子的称谓,‘鲍彦山家里的’即鲍彦山的妻子;‘哼呻’,是呻吟的象声性词汇,出自农民口语。农民口语有一主要特征,就是具体形象地表现某一情景,因而将抽象的‘呻吟’具体为‘哼呻’,‘要生了’,‘生’即分娩,是直接简洁的口语;‘不碍事’即没关系,不要紧,也是北方地区的口语。”

而在宋泽莱的《打牛滴村》中,人物自己表演的机会比较少,作者更倾向于把人物的经历、活动和特点用“讲述”的方式予以交代。例如小说这样介绍农民萧笙:“这个老大笙仔,有一颗大大的头,像月亮般圆圆的脸,看到人从来是和和蔼蔼,伊的身体肥硕得像牛一般,头上披一丛金色细腻的发,讲起话来也是细致的,最重要的是他很喜欢站着看他喂养的牲畜,每一次他都要用着和祥的手来抚摸着那几只肥大的蓝瑞斯。”王安忆认为在这段叙事中用“丛”和“细腻”修饰“发”,说讲起话来是“细致”的都是“熟词生用”,作者是用陌生化的方式激发读者的想象,通过词语巧妙搭配发掘其表现潜能。王安忆在比较中还发现,《打牛滴村》中的人物语言也表现出明显的叙述性,它不像是人物在说,而像是经过了作者的转述;这种语言也带有明显的书面语特点。如王安忆所说,“在台湾作者的小说中,即使是对话,也表现出强烈的叙述性”,人物语言“虽是口语,却是书面化或是语文化了的”。在对

《小鲍庄》和《打牛湍村》做过比较以后，王安忆认为，“大陆作家的小说往往能越过语言直接展示画面与人物的形象，而台湾作家的小说则是真正的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小说，交给读者的是文字和语言，再由这些文字和语言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情景与什么样的故事以及什么样的人。大陆的小说具有身临其境的画面感，而台湾的小说则具有阅读感”。

至于大陆、台湾文学语言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王安忆则试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寻求原因。她指出：“大陆小说创作，这一整个素朴的叙述方式的形成，也许就又有更长久的历史原因了。在‘五四’民主浪潮的推动下，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相当蓬勃，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以及所引起的讨论，其中语言即‘大众语’问题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四〇年时，延安文艺界讨论十分热烈的民族形式问题，等等，都表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已接近了一个主题：文学为普通民众。”而“台湾小说的创作直接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下来，保持了‘文人白话’的面貌。这面貌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在一定的浅显程度上使用、发展字词内古文与文言的涵义；二是在句法上欧化的倾向，比如倒装，被动，漫长的从句等等”^①。

台湾作家朱天文也提过与王安忆相似的看法。她认为，“1949年是一个很大的分野”，在大陆“1949年以后特别口语化，不仅是左翼文学，因为尽量要让普通大众来看，基本是一个口语的文学”。而在台湾，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9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批人到了台湾，走的是一个书面的文字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你的语言可以好多好多，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总有一个书面的传统。”她说，“我们是比较书面的传统长大的”。在这个问题上，朱天心则认为台湾文学比较多地继承了

^① 王安忆：《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载《上海文学》，1990年第3期，第71-72页。

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台湾文学对于大陆来说,有着补上一些失落环节的作用,中间包括了一些古典传统的部分”^①。

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以上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虽然左翼文学一直雄踞大陆文坛是文学语言倾向大众化、口语化的主因,也因此导致两岸语言的明显分野,然而如果做一个历史还原,能够看到,事实上台湾作家在文学史上也不是没有做过口语化的努力,台湾文学虽然主要继承了“五四”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是文坛上很多作家,特别是乡土作家还是乐于使用口语,包括方言土语,只是这个尝试和努力没有创造出类似大陆文学语言的那种口语化的效果。而台湾文学语言之所以没有做到口语化,除了上述两岸文学史走向的不同外,还与台湾复杂的方言有很大关系。

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口语和书面语大致的统一,而从这个角度说,台湾文学显然处在一个不利地位。因为汉语普通话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在大陆使用北方官话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而在台湾,光复之前人们使用的主要是闽南话和客家话,光复以后使用北方官话的仍然只占少数。因为闽南话、客家话与普通话有非常大的距离,台湾作家就很难像大陆作家那样能够自如地将口语用到叙事和人物语言中。对很多台湾作家来说,闽南话或客家话就是他们的日常口语,他们记忆中的人物说的也是方言土语,而在作品中要让人物实现从方言土语向普通话的转换,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台湾作家其实自新文学兴起以来一直都很注重将方言口语引入小说,特别是一些乡土作家,为了表现乡风民俗,他们尝试将很多台湾方言用于作品中。赖和就大力主张“舌头和笔尖的合一”,他的小说中

① 朱天文:《北京访谈录:从废墟到花园》,凤凰读书会:http://book.ifeng.com/dushuhui/wendang/detail_2010_08/24/2214172_5.shtml

就比较多地使用了方言。例如在小说《辱!》中就有很多方言词汇,例如:“起鼓”(开始敲鼓,即一场戏开演);“椅条”(条凳);“椅头仔”(圆凳子);“囡仔”(小孩);“冰枝”(冰棒);“查浦囡仔”(男孩);“查某囡仔”(女孩);“小生理”(小生意)等。

台湾作家难以以方言土语入文学的原因在于,首先,闽南语、客家语与普通话差别过大,大量使用方言土语会给其他方言区读者造成很大障碍,另外,与中国南方几个主要方言区,像粤语、赣语和吴语的情况相似,这些方言区的很多话是有音无字,作家要完全做到“言文一致”,或许就要在已有汉字以外再生造一些字。这样就更增加了这些方言区作家使用方言的困难。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提到方言文学有两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①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台湾作家。

汪毅夫在谈到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时指出“从总体上看,台湾现代文学作品采用了大量的台湾方言俚语。某些作家甚至抱持了用方言来写作小说的态度,……一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简直是一部‘台湾方言语汇’”。但是“总而观之,尝试用方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鲜有收获、亦终未形成群体”。在思考其背后的原因时,他指出:“看来,张我军所谓‘台湾方言是无法表记的’和连横所谓‘以台湾语而为小说,台湾人谅亦能知,但恐行之不远耳’,乃是尝试方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鲜有斩获,方言作品未能自成一类、自成为一种气候的原因。”^②

当然在台湾,作家的口语(闽南话、客家话)与书面语差距过大的情况也并非一直没有改变,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消除日语的影

①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第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65页。

② 汪毅夫:《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13~215页。